

FANYI XINJIU

翻译新究

党争胜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翻译新究

党争胜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新究 / 党争胜 编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24-08475-7

I. 翻… II. 党… III. 文学—翻译—研究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3632 号

翻 译 新 究

编 著 党争胜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32 开 9.5 印张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8475-7

定 价 16.00 元

目 录

理论研究

异化：文学翻译的适选之路	党争胜 (3)
论文学翻译中语用意义的阐释和重构	党争胜 (14)
文学翻译中的美学问题	张成柱 (26)
翻译理论、比较语言学与汉外翻译	魏令查 (38)
试探篇章的意义潜势在翻译中的体现	黑玉琴 (47)
语篇分析与英汉翻译	姚利锁 (60)
文学翻译：审美再创造的艺术	冯红钰 (67)
鲁迅的翻译与思想启蒙	李文革 (78)
浅谈制约文学作品风格手段传译的因素	杨丽娟 万霖 (92)
汉英翻译中的文化障碍	肖婉丽 (102)
浅析语用等效翻译前提下的美学效果转换	孟利 (111)
译者主体性探究	樊养才 (119)

方法探讨

英语隐喻的翻译	李辉 (131)
中国翻译的回顾与展望	罗应珍 (137)
文化意象词汇的翻译 ——以《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译本为例	梁婧扬 (144)
古文英译中的转换	彭京 (152)
中文动物商标词英译的文化视角	马静 (162)

小说翻译原则刍议: 以英语小说 *Gone With the Wind*

- 的两个汉译本为例 党争胜 李 扬 (171)
- 许渊冲英译《哭宴》评析 吴 婷 (181)
- 从翻译技巧看汉语标语的翻译 陆祖本 (189)
- 论英语定语从句的汉译 马巧正 (199)

教学改革

- 以学生为主体的翻译教学 王满良 (209)
- 同伴反馈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 杨丽娟 (220)
- 中译外翻译教学现状及对策
..... 赵 真 郝丽萍 李红丽 (228)
- 翻译实践中汉语负向迁移现象简析 毕胜利 (236)
- 汉译英过程中形合句的构建 王 巍 (246)
- 学生汉译英中的机械对应倾向 王 巍 (256)
- 提高中译外翻译质量综合措施探索 胡兆云 (269)

前言

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有关翻译研究的著述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翻译研究的这股春风也悄然吹绿了我校教师进行翻译理论和实践探讨的学术园地。在为国家培养新世纪翻译人才的同时,我校翻译教学和研究方向的教师在科研方面辛勤耕耘,收获颇丰。这些成果当中有的是质量较高的学术译著,有的是教研相长的科研论文。从研究的学科交融性来看,这些研究已经从单纯对技巧的研究扩展到对语言学、语用学、文化学、文艺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对文本的单一研究深入到对作者、译者、读者、翻译活动参与者的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既吸收了国内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又结合教师各自的教学实践,因此,他们的研究既有演绎推理的论证性成果,也有经验归纳的描述性成果。我们相信,这两种研究的结合才是翻译学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于以培养实用性、应用性为主的翻译专业的发展才更有裨益。

为推动我校翻译专业教学和研究的发展,活跃学术研究的氛围,搭建我校教学科研人员与国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们把近几年来我校教师的部分科研论文汇编成册,希望能借此促进翻译教学和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更好地为培养应用人才和科研人才服务。

本书论文众多,各叙一题,探讨范围涉及理论和方法的诸多方面。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们按照论文的研究方向对筛选出的论

文进行了归类。主要分三大部分：（1）理论研究；（2）方法探讨；（3）教学改革。由于有的论文在内容方面难以明确界定，因此，在编排归类时我们采取了“从大从宽”的原则。也就是说，按照论文内容的大方向进行归类编排。由于时间较紧，没有与作者进一步探讨，若有不妥之处，敬请作者谅解。

本论文集在汇编、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的大力支持，值此出版之际对他们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适用于外语院校师生、翻译工作者以及外语爱好者参考。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2007 年 5 月 20 日于西安外国语大学

理论研究

异化：文学翻译的适选之路

党争胜

【摘要】归化和异化是双语转化中经常使用的两种翻译方法。长期以来，翻译理论中存在主张归化翻译的倾向。翻译实践中归化译法也受到译者和译评者的偏爱。在奈达“等效”翻译理论的视野下，这种翻译方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然而，随着文化派翻译理论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能够反映翻译活动的本质、体现原语国家语言、民族文化特性的异化翻译应该受到重视和提倡。依据这种观点，本文作者认为，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有意识地选用异化的方法处理文化含义丰富的词语，以增加译文中的“洋味”。

【关键词】归化；异化；文化渗透性

一、引言

归化和异化是双语转化中经常使用的两种翻译方法。长期以来，翻译理论中存在主张归化翻译的倾向。翻译实践中归化译法也受到译者和译评者的偏爱。在奈达“等效”翻译理论的视野下，这种翻译方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然而，随着文化派翻译理论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能够反映翻译活动的本质、体现原语国家语言、民族文化特性的异化翻译应该受到重视和提倡。本文通过对翻译的实质、功用性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分析 and 探讨，论证了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使用“异化”策略

的必要性和在文学译本中保留适度“洋味”的合理性。

二、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定义

传统翻译理论普遍认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按照这个定义，人们给翻译产品设定了许多标准，国内的如严复的“信、达、雅”说，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的“神似”说，刘重德的“信达切”说等，不一而足。国外的如奈达的“同等效果”论、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论、纽马克的“交际翻译”论等，所有这些原则都是从充分再现原作的交际效果而着眼的，并没有把原作的语言问题（本文中指彰显本民族思维方式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考虑进去。因此，传统翻译理论对翻译的定义表现出“重内容轻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依据这个定义所得出的翻译标准则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重译语轻原语”的理论倾向。随着人们对翻译实质认识的不断加深，我们对翻译标准和翻译过程中应该采用的方法也应该有新的取舍。

三、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看翻译的实质

20 世纪末，学界对翻译实质的讨论逐渐由语言方向转到文化方向。在西方，以芭斯奈特（Bassnett）和勒斐维尔（Lefevere）为首的文化派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甚至把这些制约因素看做翻译的本质。文化派不满于“微观”的语言层面的研究，把翻译看做宏观的文化转换，并且认为跨文化的文本转换及其产生的作用绝不仅仅取决于文本本身的内在价值——包括语言层面的对应和相应的美学构成，于是把翻译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开始考虑语境、历史、规约这类更为宏大的课题。文化学派“颠覆”了以前的翻译理论，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

的地位，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词、句、语篇，而是文化。

当西方学者兴致盎然地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对翻译实质进行论证的同时，国内译学界也发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的呐喊。2000年出版的《文化与翻译》一书正是这一翻译新思潮的集中反映。书中30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文化传通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定向作用。

英国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文化是一种复杂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有物质和非物质两种形态。”在各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性格心理、文化传统等的差异对其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突出表现便是语言上的民族色彩烙印。“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各民族的语言就是其精神，而其精神也就是他们的语言”（周方珠，2004：40）。从语言的产生看，“一个民族的语言并不是单纯的结构与字、词的组合，而是该民族历史、哲学、艺术、心理等各方面的沉积”（许钧，1998：94）。而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看，“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归属于后者，因为语言的存在不能脱离文化，语言与文化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因此，从形式上看，译者处理的是两种语言，而实际面对的是两大片文化”（周方珠，2004：26）。语言的这种民族文化特性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但要重视原文的信息，还要尽最大努力移译原文的表达方式。因为表达方式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直接反映。用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代替原语的表达方式，虽然能够传意，却不能反映原文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帮助读者融通他们的文化，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目的。下面两个句子的翻译为例：

例1: They were only crying crocodile tears at the old man's

funeral because nobody had really liked him.

译文1: 在老头子的葬礼上, 他们只不过假惺惺地哭了几声, 因为在老人生前, 没人真的喜欢他。

译文2: 在老头子的葬礼上, 他们只不过挤了几滴鳄鱼的眼泪, 因为在老人生前, 没人真的喜欢他。

第一个译文对“crying crocodile tears”采取了归化的方法, 为读者阅读荡平了一切障碍。按照傅雷“译文读起来应不像译文”的标准, 算得上是佳译了。然而, 从文化交流的视角看, 第二个译文显然更佳。因为, “鳄鱼的眼泪”“虽为舶来品, 但其含义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直译不仅能为中国读者理解所接受, 而且能较好地体现原文的民族风格, 再现原作的民族色彩”(周方珠, 2004: 34)。

例2: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译文1: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译文2: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译文1为英国学者霍克斯(David Hawkes)在翻译《红楼梦》时的译法, 霍克斯直接把这句中国成语归化成了英语谚语“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把信佛的中国人变成了信耶稣的西方人; 译文2则是杨宪益夫妇在《红楼梦》英译本中采用的译法。采用了以中国文化为归宿的异化翻译方法, 用“heaven”表达中国人心目中“天”的文化内涵, 保留了原文的佛教色彩。从文化传通的目的看, 西方读者只有从杨的译文而不是从霍克斯的译文中揣摩中国文化中的“天”的文化内涵, 进而理解佛教文化乃至中华文化。

《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冯庆华教授在评论《红楼梦》两个译本时对杨宪益夫妇的异化译法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杨宪益夫妇更注重原文的文化与语言形式, 以

作者为基点，翻译时尽量保留原文的形象和比喻，不替读者越俎代庖，把理解与消化的空间与权力完完全全留给了译文读者。（冯庆华，2006：7—18）冯教授著作中就引用一例分析了归化译法和异化译法的区别，如下：

袭人笑道 “可是你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偶然说一句略妨碍些的话，就说不利之谈，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该的了！他便比别人娇些，也不至这样起来。”（第七十七回）杨译：

Xiren laughed.

“You’ re like ‘the magistrate who goes in for arson but won’ t allow common people to light a lamp.’ If we let slip some tactless remark you say it’ s unlucky, but it’s all right for you to talk about her dying. She maybe extra delicate, still it shouldn’ t come to that.”

霍译 “Curfew for the common people, but the Prefect can light a fire,” said Aroma drily. “What a fuss you’ d have made if I’ d said anything so unlucky! How can you bear to talk so glibly about her dying?”

从译文来看，杨译保留了原文中的典故，给西方读者带去了中国文化韵味和新鲜的表达方式，预留了理解和想象的空间。“go in for arson”和“light a lamp”所形成的对比保留了原文的修辞效果。而霍译借用了欧洲中世纪晚间定时灭火熄灯就寝的表达语，虽然更易于为西方读者所理解，但原文中由“放火”和“点灯”所形成的鲜明反差对比在霍译中则几近消失。

由此可见，过去人们对翻译的定义忽视了翻译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文化传通和思维表述方式的引介。换句话说，长期以来，人们在传统翻译定义的规约下，缺乏对翻译功用性和文化渗透性的充分认识，未能在意义传达之外研究和推动翻译对于译

入语表达方式的丰富和完善作用。

四、从翻译的功用性看异化的方法

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在论及原语与译语的相互影响时说,“对于汉语中缺少的词,我们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对于汉语中没有而外语中异常生动的表达方式,我们是否可以将之吸收到汉语中来呢?实际上,汉语中的某些表达方式是从外语中直接引入的,由于在大的范围中推广开来,这些外来的短语、表达方式已经成为汉语的一部分,成为一种常用的表达方式”(许钧 1998:105)。例如,“酸葡萄心理”指的是一种把得不到的东西说成不好的、借以自我宽慰的心理。这种表达方式并非汉语自产,而是源于《伊索寓言》中一只狐狸得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不想吃的故事。而正是翻译使得这个表达方式渐为国人所接受,成为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有时候,这种外来表达方式因高频率使用已经变得“洋味”全无,似乎是汉语中固有的表达方式。例如“象牙塔”(ivory tower),原本是舶来品,但该词在汉语中出现的频率却远远高于其在英语中出现的频率。

许钧教授的这种主张得到了刘宓庆教授的赞同。刘在《当代翻译理论》中论及“翻译体”时就认为,“在我们反对用机械主义翻译观和方法论炮制的‘翻译体’时,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由于语言接触和外语文化的渗透所推动的语言发展,这种发展往往与民族社会生活、经济形态以及人际关系的向前推进而产生的思维和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是一种积极的历史现象,它是语言在发展演进中的适度‘异化’过程。正是这种适度异化,促进了语言的自我完善。”(刘宓庆, 1999: 247)

在论及由翻译而导致的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效果时,刘宓庆教授进一步肯定了异化翻译的主张。他认为,“适度异化可以拓

宽双语之间的共性，消除双语之间在某些具体的表达方式方面的差距，使双语转换中的冲突变为平行或对应，从而缩小了可译性限度。”按照刘教授的观点，“半个世纪以来现代汉语的进步是与外语的积极影响分不开的。”（1999：103）

许崇信教授在论及翻译与文化交流时也曾用我们指导外交工作的“存异求同”原则比喻翻译的包容性。他认为在翻译中采取入乡随俗的原则无助于达到互相交流、互相理解的目的，在不少情况下客观上还起到了相反的障碍作用。

由此可见，翻译的功用性决定了我们在翻译中要注意反映民族文化所特有的规范或风情。仅仅追求内容上的同一性或读者反应的同等效果，无视蕴含在不同语言形式中的美学内涵和文化差异，不但会对原作的内容造成损伤，就是对于译者而言，其翻译作品的完整性和充分性也会大打折扣。谓其“叛徒”，也算是当之无愧的称呼。

五、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异化法的主张

翻译理论的发展，深受时代思潮的影响。“翻译过程中应该不应该保留一定程度的异化形式？”这一问题不但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也得到了国外翻译理论者的高度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产生了对结构主义的反叛，发起了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又称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思潮。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一思潮在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解构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通过翻译我们可以更深刻、更正确地认识到语言之间的差异和各种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一篇译文的价值取决于

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和对这种差异强调的程度。因此，我们在翻译中应尽量反映语言之间的差异。解构主义翻译论者反对归化的方法，主张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的方法。其理论主将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甚至认为，异化的翻译可以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尤其需要这种策略上的文化干预，以反对英语国家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异化的翻译在英语里可以成为抵御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文化上的自我欣赏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许钧，2000：177）

在韦努蒂看来，翻译永远不能，也永远不应把所有的差异都抹掉。译本应是不同的文化出现的场所，是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的场所，而抵抗这一翻译策略是建立在不连贯性的美学基础之上的：不连贯性最能保留差异，保留陌生性。他提醒读者翻译过程中的得与失，以及文化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归化的翻译要求译者对外国作者要有同情心，要求译文透明通顺；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自我陶醉。这种通顺的策略追求的是同一性，是一种自我认同，并在外国作品中寻求与目的语文化相同的文化。即在异国文化中寻找同一个自我。但是，译者只有在外国文本中找到自己的声音，才能对外国作者产生同情。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无法减少的，因而，这种自我认同也往往是错误的。然而，这一误认通过通顺的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把差异抹杀了。因此，韦努蒂呼吁：在当前透明的翻译依然统治着英美文化，通顺的翻译依然是英译者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就更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翻译的原则和策略。（许钧，2000：196—197）。

事实上，异化翻译主张并非是国外译论家的专利。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家很早以前就已论及这一点。《法句经序》记述的那一场关于“信、达、雅”的讨论，已涉及异化的问题。道安论翻